

红 鹰 传

下卷

中南海摄影师眼中的伟人情感
中南海摄影师眼中的政治波澜
中南海摄影师眼中的领袖晚景

顾保孜◎著 杜修贤等◎摄影

华 文 出 版 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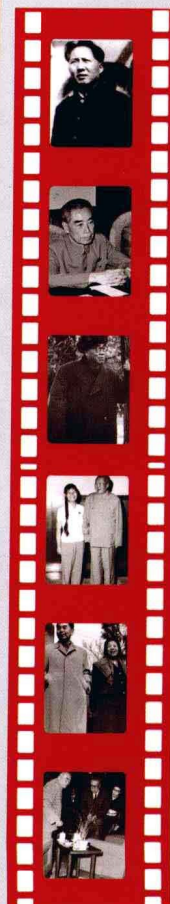
红照片

下卷

主编◎顾保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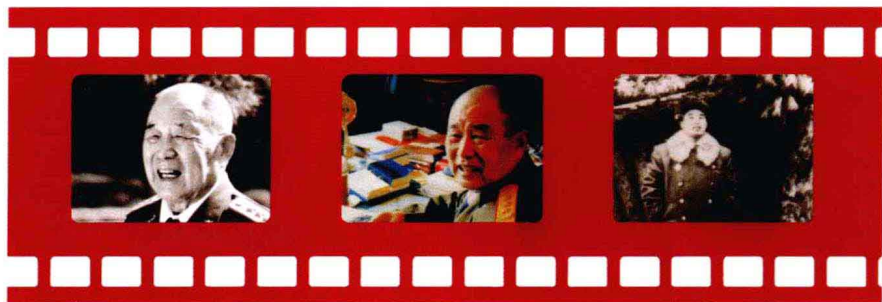


华文出版社



第 5 章

传奇上将李德生



曾记否，电影《上甘岭》曾经震撼祖国大地，震撼每个中华儿女的心扉；您可知，在“四人帮”猖獗时期有位党的副主席被迫辞职，蒙受冤屈……

这辉煌这曲折的起落人生，却是一位老将军的真实经历。他就是上将李德生！

如果用人的一张嘴和两只耳朵比喻：李德生是多用耳朵听少用嘴问的人；如果用两只眼睛比喻他又是爱用眼睛多看不爱多说的人；如果用两只手来比喻，他更是喜欢多动手做事少说大话的人了。



河南人杰地灵，英才辈出。大别山下的新县山沟孕育了一位三星将军。
从牧童到将军，人生路上不仅仅只有成功，还有鲜血和伤痛，也有苦涩的泪。



风光秀丽的大别山区

大别山的臂弯，拥抱着山区人的悲欢离合，承负着山区人的甜酸苦乐。

位于大别山地区的河南新县，出门是山开门看山，山构成了这个地区特有的一方水土，也赋予了这方人特有的性格。

解放前，这里的穷人像山上密布的石块，数也数不清；穷人的日子好似山峦土丘，沉重、黑暗而漫长。

1916年，一个名叫李家洼的山村，迎来了一个苦孩子的降生。添人进口本来是家庭大喜事，可是贫寒的家庭除增添了一张吃饭的口，就是心上多了个秋——愁。即使这个男孩子是长子，能把祖上的香火继续燃烧下去。可是，贫穷把人间亲情和天伦之乐吞食得那样现实那样无奈。李德生4、5岁时，唯一的妹妹被疾病夺去了生命，悲痛欲绝的母亲

承受后也眼睛一闭，撒手撒下他，永远地走了。刚刚才会说话才会走路的李德生，就用幼小的心灵承受了幼年丧母这人间最为不幸的灾难。

如果说山能赋予人凝重宽厚的性格，那么独特的经历能使人更加成熟。别人都说李德生深沉、冷静，有坚强的承受力。这一定和他苦难的童年有关。

母亲去世后，没娘的孩子像根草，还没有牛高的李德生，为了糊口，不得不去给别人放牛，成了一个放牛娃。

古人曰：穷则思变。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大概是千古不变的社会规律。

李德生家乡和湖北、安徽交界，同属大别山地区，也同属贫穷。

1927年，中国共产党在湖北麻黄发动起义，和麻黄相距数十里的新县百姓，很快也揭杆而起，才11岁的李德生参加了牧童工会，还代表牧童参加边区政府代表大会呢！

1930年初，他不满14岁，成了一名红军战士，开始了他漫长的戎马生涯。走的那天，他第一次发现小山村的灯火多像母亲温暖的眼睛，尽管他已记不得母亲的容颜，可是他相信母亲就像这灯火在注视他，鼓励着他。他用冻得通红的小脚丫，拨弄着足下的黄土，良久良久，才一扭头，大步走上离别亲人离别大别山、寻求革命真理的道路。

那时的他，绝不会知道“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的名言，但是他



年轻时的李德生。（历史照片）

却知道要当兵就要当好兵。所以，一个好兵在战场中，要么冲锋在前，要么饮弹倒下，总是出类拔萃的。

战争能把人塑造成优秀的人。李德生就是在战争中成长、战争中成才的。在这条通往将军的路上，每前进一步都付出了血的代价。他负伤六次，有两次和阎王爷碰了面，阎王爷不要才又魂归人间的。至今他身上还留着敌人的弹片，左手也因枪伤，留下了终身的残疾。

1950年新中国成立时，他已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副军长。他来不及在和平的国土呼吸没有硝烟的自由空气，也来不及和家人团聚，美帝国主义又把战火烧到和东北毗邻的朝鲜，李德生又一次整装待发。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随着彭德怀司令员跨过了鸭绿江，参加了举世闻名的抗美援朝战争。

1955年9月，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授军衔。李德生被授予少将军衔，同时被授予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又授予上将军衔。这是党和人民给予他的崇高荣誉。1957年，他走进高等军事院校，一读就是3年，从赤足牧童到转战南北的指挥官，这样坐下来学习知识，还是第一次。这为他以后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奠定了理论基础。



上图：上甘岭前线指挥李德生在德山岬指挥所坑道口。（历史照片）

中图：上甘岭战役中战士正在激战。（历史照片）

下图：李德生和吴效闵在朝鲜前线。（历史照片）



“文革”开始，有的城市在所谓“文攻武卫”旗子下发生严重武斗，李德生受命于周恩来。前往安徽制止武斗，两派火力网里，他只身爬上楼外的软梯。

1967年夏天，不仅是一年四季中温度最高的季节，也是“文革”开始以来“温度”最高的一段日子，所谓的“红色风暴”在口号加枪炮声中横扫了中国大部分地区。中华大地陷入了史无前例的混乱之中，人们由唇枪舌战迅速升级到真枪实弹。火炮相拼的武斗给社会秩序和人民生命财产带来了严重危害，干扰了人们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李德生这时任南京军区12军军长，驻扎在安徽境内，社会的混乱现象还没有扰乱部队，所有工作还在正常的轨道上运行。

一天，李德生突然接到千里之外的电话，这是周恩来总理的紧急电话！

周恩来用急切的口气命令他：立即来北京，有重要任务。马上有一架专机去接你。

军令如山倒！何况在这特殊时期。端军人饭碗端了大半辈子的将军，马上意识到此次进京非同一般。果然他一到北京，没有等他喘口气，周恩来立即召见他。一见面，周恩来没有寒暄，也没有表现出以往对部下问长问短的关切，他看见李德生一进门，马上起身迎上前，握手间，周恩来就将调他来京的意图简短表明了。坐下后，又详细地介绍了安徽乃至全国的形势。“形势很严峻啦，令人担忧。”李德生听见周恩来沉重的语气，心不由地往下一沉，他虽然在安徽，但没有直接参与地方领导，还不知道安



徽局势恶化得这样快，连中型城市也卷入了武斗行列。

周恩来最后命令他立即返回安徽，带部队去首府合肥，越快越好！

周恩来用严峻的目光注视着眼前这位受命于危难的将军，这目光包含着信赖和相知。

周恩来为什么这时要叫李德生出山，不是没有道理的，抗美援朝中，开创世界战争罕见记录的上甘岭战役就是李德生率领的部队创造的。上甘岭战役是朝鲜战场上最为艰苦、作战时间最长的一次战役，电影《上甘岭》之所以能引起亿万人民无比的自豪，就在于它打出中国的军威、国威。

可这一次，李德生将军面对的不是



楼顶修筑的武斗工事。(历史照片)

日寇，不是美国鬼子，也不是国民党军队，而是自己的同胞、自己的人民，解决这个矛盾要比对付真正的敌人难得多。

如果没有难度，周恩来也不会彻夜不眠，将他从千里之外调到北京亲自布置任务。周恩来在“文革”中竭力把损失减少到最小程度，李德生是深有体会的。

临走，周恩来又扼要地叮咛了几句：“制止武斗，消除派性，促进联合，稳定局势，抓革命促生产。”

无须多言，李德生非常理解一国总理此时此刻焦急担忧的心境，他没有半点犹豫便爽快地接受了这个特殊的任务。

他没有在北京停留，当即返回所在部队，随后又日夜兼程带领军直机关赶往合肥。

合肥上空这时已经硝烟弥漫，大楼也好，街道也好，甚至是居民的住宅，也都成了枪战的掩体。连日来已经发生多次流血事件，两派群众没有因为死亡、流血而放弃敌对情绪，正好相反，敌对情绪犹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武斗场面像脱缰的野马，什么人都拉不住缰绳。个个红了眼，大有不战死决不休的架势。整个城市好像充满了浓烈的瓦斯，一丁点儿火星，都会引起剧烈爆炸。

刻不容缓！李德生带着干部战士，把汽车开进两派对峙的“前沿阵地”，这时的人们已失去了冷静的头脑，也不管来什么人，干什么来，照样开枪不误。有丰富作战经验的干部战士，这时有用了用武之地，躲开正面射点目标，在密布的火力网下，开始了猛烈的“前沿”宣传攻势，没想到这一喊话，还真起到一定冷却作用，特别是李德生将军亲自做宣传工作，使两派群众有了信任感，认识到这样武斗是违背中央精神的，违背毛

主席指示的。渐渐地枪声稀落下来，混乱局势得到了控制。接着李德生趁热打铁，亲自和两派代表谈话，反复宣传中央的政策，促使局势走向稳定，两派实现了大联合。

没有多久，合肥接待了刚果的客人，这是周恩来总理的安排，也是对李德生稳定合肥局势的肯定和褒奖。

制止武斗有时要冒生命危险。一次李德生到武斗严重的芜湖，那时芜湖的武斗达到了极端的程度。一派群众被另一派围困在一个楼里，恶性事件眼看就要发生。千钧一发的时刻，李德生赶到现场，被围困的一派从窗户里放下一个软梯，只准李德生一个人上来和他们谈判。警卫人员一见，死活不敢让军长一个人去冒险。虽说上面不是虎穴，但是他们对上面的情况不了解，再说“文革”以来，多少党的高级干部被打死整死，哪里还有什么法制可言！让军长单独和对方谈判，搞不好会出事的，怎么向中央交代？

一听大家的担忧，对部下从不高声责备的李德生，这时有点生气了，说：“怕什么？如果我被打死了，坏人也就暴露了，群众就会觉悟了，问题不就可以解决了吗？”说完不等大家阻止他，就爬上了软梯。

他这个举动就足以叫两派群众感动，武斗的紧张局势随之解除。



武斗中被烧毁的民房。(历史照片)



1964年，李德生军长(左)与郭兴福(右)在训练场上。(历史照片)



1969年李德生调中央工作，被毛泽东派到林彪把持的军委办事组工作，成了掺进林彪集团眼中的一粒沙子。

1969年4月，担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李德生在“九大”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回到安徽不久，天气渐渐炎热起来，李德生接到周恩来的电话，中央决定把他调往北京工作。

离开基层，李德生还真有点舍不得呢！

在周恩来面前，他也没顾忌便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最好不要让他离开相依为命的基层部队，再说他也适合在基层工作。

周恩来在电话里笑了：这是中央的决定，也是工作的需要。

李德生匆匆交代了一下工作，乘上了飞往北京的飞机，当飞机穿进云层



李德生陪同叶剑英接见部队战士。

(历史照片)



1979年9月，彭冲、李德生等领导陪同邓小平同志在大庆石化总厂视察。（历史照片）

时，层层叠叠的云团朝着飞机压来，流走，又压来，又流走。这似乎象征了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正悄悄酝酿，飞速临近……

机翼下，北京渐渐离李德生近了，风起云涌的中心也渐渐地近了……

长期在下面工作的李德生怎会知道此时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担忧。

林彪成为写进党章里的接班人后，他的势力范围日益扩大。军委已被林彪和他的亲信把持，陆海空三军的军权都在他们手里。在他们的反党行为没有充分暴露以前，大家都不会也不敢随便乱加猜测。现在回想起来还真有点后怕，如果他们阴谋得逞，那么，最先倒塌的是钢铁长城。

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对林彪重兵在握，内心是很担忧的，也是很警惕的。最后考虑用“掺沙子”的方法抑制林彪势力的增长。可是这“沙子”的人选并不是太好选的。老帅们受冷落，都没有出来工作，老将们也受冲击，掺进去也不合适，搞不好还要受林彪的整。进军

委工作的人首先应不会和林彪搞到一块去，并且要有一定的群众基础。

反复考虑，最后决定了几个人，李德生便是其中的一位。

李德生到京的当天，周恩来便把中央的决定告诉了他：担任总政治部主任，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和军委办事组工作，同时兼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

李德生心里有点紧张，这个担子太重了，怕做不好！

过了几天，周恩来高兴地通知他：主席要见见他。

见到毛泽东主席对于将军来说或许不是什么新鲜事情，但是亲自被毛泽东点名请去面对面谈话，却是李德生生平第一次。

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接见了，兴奋中他有点紧张，可是走进毛泽东居住的房间，紧张的感觉不知不觉消失了。毛泽东的房间没有什么摆设，满眼都是书，尤其是线装的古书特别多，连睡觉的大床也堆着书。毛泽东的随和、简单使人感到亲切。特别是在谈话间，



毛泽东随手拿起陪同一起来的周恩来的老花镜，往眼睛上试戴了一下，还远远看看合适不合适。这个常人的举动，更让他感到亲切。

他们的谈话很轻松，周恩来在一旁不时地插话补充，最后毛泽东问李德生看没看过《红楼梦》？军人出身的人对古典小说一般读的不多，至少是没有研究。

主席却认真地说：“要读《红楼梦》。《红楼梦》我看了5遍才解开。《天演论》和《通鉴纪事本末》也要看。”李德生当时并不能一下子理解主席叫读古书的意义，后来在实践中逐渐明白，主席叫高级领导从历史中学会借鉴，博古才能通今。

李德生对毛泽东说自己水平不高，怕不能胜任这么重要的工作。安徽、南京的工作能不能免去？毛泽东一听，连连摇手，不能免，一个也不要免。周恩来在一旁也鼓励他大胆干。

中央军委办事组也就是“文革”前的军委，因为林彪拉帮结派，许多人都倒向了林彪，矛盾非常尖锐。如果没有

较好的修养和沉着冷静的头脑，是不能保持出污泥而不染的。

李德生去工作，显而易见不是林彪的人，谁也不和他交流情况。轻一点把他当外人，什么话不和他讲，重一点把他当敌人，想法要排挤整治他。有时军委开会，整场会议像没这个人似的，表决什么问题，事先不征求意见，事后不交换看法，同意不同意横竖是要通过的。人在这个环境里会是什么感觉，可想而知。谁都会有压抑感、陌生感和被排斥感，可是李德生默默地承受了这种冷漠和轻视。他心里只想着一件事：我是毛泽东和周恩来派来工作的，我的行为对中央负责，对军委负责，至于个人的失落委屈，不过是暂时的，就当它是过眼云烟，不往心里去，不往脸上挂。后来毛泽东问他情况时，他也不多说自己的情况。

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他表面上沉默寡言，但私下却积极调查研究，了解各方面的情况。

1971年9月12日中午，也是林彪叛党逃跑的前一天，毛泽东提前结束南方



1978年，李德生与在东北视察工作的邓小平亲切交谈。（历史照片）

的视察回到了北京。在丰台火车站，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和吴忠走上毛泽东的专列，毛泽东在和他们几位谈话时，不时流露这个担忧，甚至忠告大家，要提高警惕，防止分裂党的行为。最后毛泽东吩咐李德生调一个师来南口，干什么他没有说。

毛泽东担心的事当晚就发生了，林彪带妻携子乘机叛逃，走上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的道路。

飞机一跑，谁也不知道会去哪，后果怎样。人民大会堂成为指挥中心，李德生当时还在大会堂开会，当他知道这个情况，没有惊慌，而是沉着冷静协助周恩来工作。空军是“重灾区”，空军司令吴法宪就是林彪的死党，不然林彪也不会有这样便利的外逃机会。紧急关头，周恩来最不能放心的就是空军，李德生受周恩来重托，在空军招待所指挥，整整5天5夜没有合眼。

事后周恩来说：“当时情况不明，我们派德生同志去空军，他是只身入虎穴，我们都为他捏了把汗，但结果还是我们胜利了。”林彪事件后，李德生又参加了清查林彪反党集团的专案工作。

从1969年进军委工作，李德生始终是林彪眼里的一粒沙子，林彪集团的人极力地排挤他，想把他挤出军委。然而，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大肆鼓吹“天才论”和设国家主席，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从庐山回来，李德生不是冷落他，而是接受毛泽东指示，随同周恩来总理一道去北戴河，亲自做林彪的工作，希望他悬崖勒马，认识自己的错误；并且出来参加中央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这是中央给他一个悔过自新的机会，实际也是一个下台的台阶。但是林彪一不检查、二不开会、三不参加活动，抵触情绪很大，一意孤行，直到折戟沉沙，摔死在温都尔汗。

第十次党代会上，李德生成为五位副主席中的一位。可是树大招风，引起了江青的不满，找茬的事情接二连三地发生。

林彪事件后，长期被林彪冷落排挤的高级将领们头上的“大山”终于被搬开了，多年的委屈、苦恼和愤慨化作两行清泪，酣畅痛快地吐出了压抑在心底的愤怒。

军队的工作有了新的局面，焕发了从未有过的活力。冷落多年的叶剑英元帅被重新起用，主持军委工作，以前那种结党营私、不光明正大的丑恶现象在军委中消失了，大家有了一个愉快的工作环境。

1973年8月，党的十大在北京召开，

李德生以他独特的经历和特殊的功绩，走上了党的副主席岗位。他在林彪把持下的军委办事组工作，却自始至终对党对军队保持忠诚的本质，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李德生成为党的领导人，这无形中又在江青一伙通往最高权力的道路上树立了一道屏障。之前江青他们和林彪相互利用相互勾结又相互拆台。特别是庐山会议上，江青对林彪设国家主席是持反对态度的，成为胜利的一派。正好林彪又垮台了，江青手里有了反对林彪的资



本,以为可以一手遮天了。可是大家都知道,在林彪叛逃前一个月,《解放军画报》7、8两月合刊上,第一张大照片就是江青从庐山回来后,专门请林彪来钓鱼台她的摄影室里,亲手给他拍的,画面上的林彪手捧毛主席著作认真阅读,江青为照片取名“孜孜不倦”。可见,江青当时还想继续利用林彪,对他的垮台没有一点预见。

但是江青却以功臣自居,向党要权要职务。“十大”她进入中央政治局,但她还不满意,只是委员却不是常委。直到“十大”,“四人帮”的势力开始形成,王张江姚都进了中央政治局。

李德生对江青他们一直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后来担任总政主任有许多问题无法回避江青,特别是拍摄“样板戏”电影。江青长期对“八一厂”不能占为已有而耿耿于怀,李德生没有听从江青的“指示”,恢复了八一厂的军队建制,可把江青气坏了,这不是拆“样板戏”的台吗?由此和李德生暗暗结下仇。

记得林彪事件不久,军委处于高度

紧张之中,叶帅刚出来主持军委工作,担子很重,几位领导在军委开会常常要到凌晨一、两点。这天半夜,江青突然风风火火跑进会议室,进门就叫道:“你们要为我作主!”

开会的人都吓了一跳,大家紧张地盯着江青,以为发生了什么事了不得的大事。平时大家也知道江青喜欢一惊一咋地,好像什么事经她一折腾,天都能塌下来。

“你们要为我作主。八一厂有人搞破坏,破坏样板戏……”

听到样板戏,大家松了口气,类似这样话题的戏不知演出了多少次了,见多不怪了。

“你们要和我一起去八一厂,把那些坏蛋揪出来。”

李德生忍不住问了一句:“都是什么事情啊?”

“什么事情,简直是重大破坏。他们拍摄样板戏用淘汰的摄影机拍,故意拍坏。没有质量。”

天,就这事情?岂有此理!



李德生司令员和部队文艺工作者在一起。(历史照片)

说来江青也真有胆子，用这样的芝麻小事也敢中止军委的会议，让所有人围着她的样板戏去转。叶帅才出来，既不能阻止又不能说服。

李德生心想，他是总政主任，八一厂归他领导，这事应该由他来解决，就说：“江青同志，今天天不早了，你先回去休息，明天一早我就去八一厂处理这件事情。”

江青头一昂，瞪了一眼李德生，满脸更加不高兴：“回去？我今天来就是要解决问题的，不解决我不回去。”

李德生又好言相劝了半天，江青就是不听，任着性子一定要当时就去八一厂。

叶帅肚里可能窝火，突然站起来，击拍桌子下命令：“停止会议。走！”

江青起身就往外走，已经是下半夜了，她好像才睡醒，精神抖擞的。

大家只好拖着疲惫的身躯随江青去郊外的八一电影制片厂。

江青突然来到八一厂，厂领导全从被窝里被叫起来。一到厂会议室，他们立即被眼前的阵势吓出一身冷汗，全清醒了！心里直紧张，发生什么事了？军委所有的领导都到场了。

结果江青批你一通批他一通，出了气。叶帅等江青语气缓和一些时，就说了几句，要大家搞好团结，做好工作，设备旧了及时向上级汇报，可以更新。

等大家驱车回到军委会议室，指针已经指到凌晨3点，大家累极了，比去打仗还累人，这是一种来自内心的累，不是睡一觉能消除的累。

事情过后，江青却在这个问题上又计了李德生一笔帐，为什么不支持她江青，反而劝说阻止。这是什么行为？等到林彪垮台后，这些问题竟然成了李德

生上林彪贼船的罪证！

1973年10月，江青又开始新的活动，她在清华、北大发动了所谓“反击右倾回潮运动”，声称要上揪“代表人物”下扫“社会基层”，拉开了批林批孔的序幕。

作为总政主任，李德生的政治嗅觉不是辨别新的风向，而是辨别是非曲直。他觉得批林批孔不能搞乱军队，军队首先是稳定其后才是参与。他们领导班子集体做出了决定，部队的报刊在批林批孔文章上要 and 中央保持一致，对于批林批孔的意义、动态等重大提法，要按照中央两报一刊的提法。通知一发出，马上就有人汇报给了江青，这不是在唱对台戏吗？

“军队不批孔批什么？不批孔也是不批林。李德生反对批林批孔是不是上了林彪的贼船？和林彪是一条路上的人！你们要去批！”

李德生的“问题”终于上了一个高度，不是什么对样板戏的态度问题，而是和林彪反党集团搞没搞到一起的问题，是路线问题是态度问题是大问题！到了1974年3月5日，史称的“三·五”放火烧荒事件在江青一手导演下出台了。

总政、八一厂等地在一天里出现了相同的大字报，李德生成了军队里的大军阀，党里的大党阀，是林彪集团的人等等，富有煽动性的大字报很快就散发到各地，引起了军队内部的困惑和混乱。

现在细想，这一系列做法，不仅仅是江青发泄私愤的行为，而是反党夺权的一个步骤，先乱党后乱军，才能达到他们夺取最高权力的目的。拿李德生开刀只是他们乱军的一个借口。

1972年11月9日，周恩来、廖承志、李德生会见日本“中国归还者联络会（正统）”会长藤田茂率领的第二次访华团全体团员。（历史照片）





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李德生服从命令，受到毛泽东的赞扬。江青的攻击，他成了沈阳军区“坐冷板凳”的领导人。



李德生

下图一：1977年，沈阳军区司令员李德生看望雷锋班战士。（历史照片）

下图二：李德生（前）和廖汉生、陈再道在一起。（历史照片）



李德生被整的情况，周恩来很快就知道了，他马上将情况汇报给了毛泽东。

那时正是“四人帮”最为猖狂最为得意的时候，连毛泽东的话他们也可以不听。毛泽东有时对他们也采取息事宁人的方法。如果太过分，毛泽东才会出面严厉批评他们。1974年下半年，“四人帮”问题就是毛泽东首先提出的。

毛泽东对李德生一下子想不出最好的保护办法，又无法立即制止江青的行为，就提议李德生惹不起就躲，意思是叫暂避锋芒，以待时机。去哪里呢，周恩来叫他先去沈阳。

“十大”之后，毛泽东为检验军队的作风和服从命令的素质，搞了一次除新疆、成都和昆明外的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李德生当时兼任北京军区司令员职务，和沈阳军区的陈锡联对调，十天内对调的司令员们必须到位上任。

对调前毛泽东又一次把李德生找去，征求李德生对调动的意见。

李德生向毛泽东表了态，服从中央的决定，对这次对调没有意见。毛泽东关切地问他：要不要带几个人去？

“不需要带人，沈阳军区有过去的老上级，去了能和他们搞好工作的。”

毛泽东满意地点点头：“有人一听调动就火冒三丈，不愿意离开老单位。

军人要记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一条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

最后毛泽东又说：“除了不兼总政主任外，其他职务都不动。”

没有想到李德生到了沈阳，江青他们的手也伸到了沈阳。从1974年初到下半年整整半年，他没有任何党内职务，直到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直接过问下，才担任沈阳军区第一书记。因为江青他们不停地向沈阳“灌风”、“打气”，李德生成了有其位无其实的“冷板凳”书记。

1975年1月，李德生在十届二中全会上辞去了党中央副主席的职务。

1980年，中央和军委为李德生彻底平反。

1985年，李德生从沈阳军区调到国防大学担任政治委员。

1990年，李德生从现职岗位上退了下来。

合上这沉重且真诚的历史画页时，一位老人又来到河南新县的山沟，这是他1930年离开以后第二次回家。

“少小离家老人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将军相见家乡儿童却另有一番感慨，忧虑山区的孩子上学难，长大往何处去？

他开始为家乡的儿童四处集资，后来终于办起了李家洼小学。

希望之火在将军手中点燃，希望之火在中华民族大地上燃烧、延伸。

第 6 章

中南海的警卫岁月



中央警卫工作不仅有自我牺牲的意识，更可贵的是忍辱负重、顾全大局的自我牺牲精神。他们虽然面临的不是枪林弹雨的战场，然而高层政治斗争忽左忽右的明枪暗箭绝不亚于一个出生入死的战场。警卫人员既要履行军人执行命令的天职，保卫首长生命安全；又要在错综复杂的斗争中明辨是非，维护自己的尊严。

如果不是屏气静声地聆听那个来自遥远的特殊年代的叙述，谁也无法相信：紧跟中央领导人的警卫生涯竟会不是风光神气，令人眩目的职业？在别人咂咂的羡慕和赞美声中，他们默默地品尝忍耐的艰辛和谨慎的苦涩。

文革小组抽调负责外事警卫的领导，40岁的邹吉成“中标”，一干就是十多年。

1966年“文化大革命”狂风暴雨般地猛烈冲击着宁静和平的国度，中国陷入了史无前例的狂乱之中，一个有着正常秩序的国家像出轨的列车，瘫了。一向循规蹈矩的人们着魔般地在中国版图上“南征北战大串连”。

从1966年的8月到11月，毛泽东不歇气地一连8次登上天安门城楼接见百万红卫兵。

“千万颗红心向着北京
千万张笑脸迎着红太阳

……”

城楼上激动不已的领袖和广场上热泪长流的人民，此时都虔诚拥有一个希望，一个憧憬：立志将中国建设成反帝反修的坚强长城，一个永不变色的社会主义国家！

这时，平静的中南海在酝酿着惊涛骇浪……

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



天安门城楼前，人们高举毛泽东语录。



六通知》，宣布撤销原来由彭真具体领导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陈伯达担任新设立的文革小组组长，江青则为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康生是顾问。到这时为止，中央文革小组才算完成了“最佳人选组合”方案。江青正式登上政治舞台。

中央文革小组设在钓鱼台。虽称“小组”，可是架子并不“小”，待遇都是政治局常委级的，他们外出时要配备随车，配随车就要配警卫员，中央警卫处（那时还不称警卫局）的一处专门负责中央领导人的警卫，可是人手一时跟不上文革小组成员的升迁，实在抽不出人来跟着随车。处里就叫负责外事警卫的二处抽人，正好，负责外事警卫的二处人手过剩。“文革”的一场大火把外事活动的航线都烧断了，外宾谁也不敢对中国的“内战”进行观光考察。不来外宾，二处就没事可干，紧张的人手过剩了。

邬吉成当时是 8341 部队的副政委，

又是警卫处副处长，负责二处的外事警卫领导工作，他见文革小组来要人，看看自己管辖的二处的确没有什么重要的活动需要警卫，就同意抽人去钓鱼台。

“文革”前外事活动多，不是总理出国访问就是外宾来中国访问，常常忙得他们日夜不着家，跟着外宾后面转，生怕出一点乱子，让总理分心。因为他们处的卫士常常被派往跟随来访的外宾和警卫外事活动场所。总理对邬吉成非常熟悉，这不仅仅因为他是负责外事警卫工作的副处长，1940年在陕北延安邬吉成就是中央警卫班的卫士，担任中央首长的警卫。不过在总理的眼里，邬吉成还是个小后生。后来邬吉成又跟着党中央走进北京，走进中南海，在首长们的眼皮底下，耳濡目染，日渐成熟。几十年的警卫生涯，40岁出头的他已经是久经考验的老警卫了。

总理对外事警卫十分重视，经常向邬吉成了解警卫情况，外宾有什么要

接受检阅的红卫兵和群众队伍。